



疫病退散—— 唐代佛教的另類防治救濟

■ 王鍾承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已逾二年有餘，防治措施不論採用佛系，或是堅壁清野方式，身處二十一世紀醫學發達的我們仍然處於恐慌之中。自古人類在面對疫病發生之際，易於六神無主，即使盛世如唐代（618-907），官方醫療的受惠者極為有限，於是宗教成為許多唐人疫病防治的選擇。除了道教和巫覡之外，佛教的救濟早已行之有年，不可小覷。釋教不但進行實際之醫療，同時也經由傳教提供心靈的防治，後者之遺存即為本文重點。

引言

自古人類在面對疾病發生之際，易於六神無主，總是處於恐慌之中，即便是盛世如唐代也不外於此。唐代各項制度完善的程度向為史家所讚頌，醫療體制自然屬於其中一環，不但制定「醫疾令」的醫療法令，也建立醫療組織，諸如中央的太醫署和各州府設立「醫博士」等醫學人才，官方醫學頗為發達。然而這些醫療組織不是為了滿足皇室之需求，就是為上層社會服務，官方醫療的受惠者極為有限。雖說文明的唐代政府還會頒布醫書、藥方於公眾之處，作為彌補醫療資源不均的缺憾；甚至在嚴重的疫病發生時，清明的政府還會遣醫送藥，但是皆屬偶發事件，不論是人數或是成效上，能加惠於平民者甚寡。至於民眾的一般疾病就更只剩下自救一途，絕大部分求助於民間力量。民間醫療常常因良莠不齊，得不到民眾全然的信賴。即使有身懷絕技和獨特秘方的良醫，也有遭貶謫卻負有使命感而自學醫術的有志者，但屢屢出現令人疑慮的醫藥資源、醫療費用與藥材品質等問題。在此官方醫療求之不得和民間醫療望之卻步的情況下，宗教於是成為許多唐人疾病防治的選擇。除了道教和巫覡之外，佛教的救濟早已行之有年，不可小覷。

施醫給藥符合佛教救度苦難眾生之初衷，尤其是《梵網經》卷二有言：「見一切疾病人，常應供養如佛無異，八福田中，看病福田第一福田。」即在所有功德之中，以醫病的福田為最。對於佛教徒，尤其是對僧尼而言，能令眾生解除病痛之苦不但是實踐教義的最佳修行方式，更有利於佛教的傳播。畢竟患者在治癒後油然而生的信賴感，將會轉化成為求醫者皈依佛教的緣起。實際上，不僅僅只有一些具有醫藥知識的遊化僧行化各地，經常深入官方醫療未曾

照顧的偏僻之處，主動施予醫藥之救濟，甚至還有許多寺院建置病坊，成為重要的求醫場所。由於寺院掌握相當多的醫療資源和民心，一方面致使唐代政府因忌憚而試圖禁止僧道的醫療行為，另一方面也導致了良性競爭，即前述皇帝下令編集藥方、醫書並頒布公告州縣公眾之處。這種種的限制與競爭正顯示寺院的影響力不容忽視，給予政府不小壓力。究其因，不外乎寺院基於上述福田思想及傳教之故，對於患者來者不拒。此外，對求醫者而言，僧醫常常不會收取費用，或是由求醫者隨喜供養。更遑論，許多寺院依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西元前 273-232 在位）「藥藏」設施的傳統，即於寺院範圍內規劃貯備藥材之處，以便隨時提供不時之需的救濟，甚或還有寺院開闢栽植藥草的藥圃，強化「藥藏」的貯備功能。因此，在唐代醫療領域中，設置病坊的寺院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官方難以完全禁止僧醫治療行為。也正因如此，寺院的醫療和人力資源能彌補官方救濟貧病的部分缺口。然而卻也有一些病坊所能容納患者的數量似乎不如想像地樂觀，例如從天寶年間（742-756）敦煌郡會計牒的敦煌文書（P. 3262 及 P. 2626）來看，敦煌病坊僅能收治約十名患者，如遇疫病的大流行，病床數量實是處於捉襟見肘的窘境。¹

在許多實際醫療有限的情況之下，除了一些有關醫藥記載的佛經和服藥的同時要口誦佛菩薩名號之醫囑外，佛教還藉由具有大悲願力的諸佛菩薩，再度開啓另一扇救濟之門，展現另類正向能量的心靈治療。寺院鼓勵佛教徒參加法會、行懺法、誦經、稱名（佛菩薩名號）、寫經、開窟和造像等都是累積功德的方法，後三者皆有遺存於世。特定的佛菩薩各有其撫慰信徒之面向，以下列舉唐代與除疫、祛疾有關

的常見尊像，即觀音菩薩和藥師佛。

觀音菩薩

梵文轉寫的 Avalokiteśvara 漢譯名稱因對字義解釋之不同而有差異較大的二類，其一見於早期漢譯佛經如《法華經·普門品》敘述此名稱之因緣，衆生因受苦而「一心稱名」，Avalokiteśvara 觀其音聲，苦難衆生即得解脫，進而稱之為觀世音菩薩，亦名觀音菩薩。其二是玄奘（600-664）所譯之觀自在，譯名強調祂的智慧具有通達無礙之特質。祂是佛教諸尊之中流傳最廣，也最受信賴的菩薩之一。為因應信仰之需求，造像類型多元，常有許多變化，當然也包括許多具有除疫祛病特質的觀音菩薩。

楊柳觀音菩薩

楊柳觀音即是具有該特質的菩薩，祂的圖像典出雜密系的《請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呪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二十冊，以下佛經皆出於此冊，故皆省略）。該經敘述毘舍離城遭逢惡病降臨，全城民衆命在旦夕，故備楊枝淨水，獻給觀音菩薩。祂因其大悲之性格，為衆生消災解厄，不但教導民衆如何「為免苦厄而請觀世音」，即稱念皈依佛法僧三寶和觀世音名號，「燒眾名香五體投地，向於西方一心一意令氣息定」，甚至還宣說誦持諸咒語的功德，其中之一即為「令得無患」。而就在念誦咒語之後，「毘舍離人平復如本」。於是持楊柳的觀音菩薩與除疫祛病之間劃上了等號，成為中國獨創的特有圖像，造像不絕於史。現在具有紀年最早的造像遺例可追溯至南齊建武二年（495），即藏於美國舊金山亞洲美術館（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的鑲金觀音像。本院也度藏一些遺例，例如〈青銅鑲金觀音菩薩立像〉。（圖1）

此尊造像頂有化佛，象徵觀音是阿彌陀佛的眷屬，也是在彌陀淨土可以繼位的一生補處菩薩。身披天衣，下著裙裳，上舉的右手握執楊柳，下垂的左手持拿淨瓶，應是為諸有情除疫祛病的楊柳觀音。相對於另一尊盛唐造像（圖2），雖然造型極為相似，但頭部不再微微低垂，重心放在右腳的S形站姿也不再具有明顯的動勢，原本面如滿月的臉龐也變得較為方圓，身軀肌肉的表現也不再緊勁有力而有所鬆



圖1 唐 8世紀 青銅鑲金觀音菩薩立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銅000126



圖2 盛唐 青銅鎏金觀音菩薩立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銅000124

弛，衣飾也增添了许多圖案化和裝飾趣味，與中唐造像風格較為相近，應為八世紀的造像。

千手千眼觀音菩薩

觀音菩薩為何會具足千手千眼的變化之身呢？緣由可見於《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之記述。觀音菩薩於過去世，聽聞過去佛宣說此陀羅尼，心生歡喜，隨即發下宏願：「若我當來堪能利益安樂一切眾生者，令我即時身生千手千眼具足。」誓願說畢，觀音菩薩應時成為具足千手千眼之身，此變化之身即是對於受持此陀羅尼者「以千眼照見，千手護持」的承諾。此外，還特別說明誦持此陀羅尼神呪者有諸多廣大利益，其中一

項即為「世間八萬四千種病，悉皆治之無不差者。」此咒無所不愈的利益，應是千手千眼觀音（Ekādaśa-mukha）菩薩獲得求愈者崇敬的原因吧！

有關千手千眼觀音的漢譯經典始於唐太宗時期（626-649 在位），十餘部譯本也大多完成於唐代。有關最早的造像，如依古籍之記載，應為初唐，即宋代張邦基（活動於南北宋之間）的《墨莊漫錄》卷十記錄襄陽天仙寺正殿大壁「畫大悲千手眼菩薩像，世傳唐武德（618-626）初，寺尼作殿，求良工圖繪」，而敦煌的千手千眼觀音經變現存五十七鋪，而唐代就佔二十三鋪，最早的則見於盛唐。

莫高窟第 148 窟主室東壁入口上方繪有一鋪千手千眼觀音經變（圖 3），² 觀音冠有立化佛，面容豐腴，表情嚴肅，結跏趺坐於自蓮池升起的蓮臺上，共有四十手，是敦煌常見之臂數，分別施各種手印及持物，諸如蓮花、三叉戟、水瓶、軍持、如意輪、羂索、寶珠、寶幢、寶印、柳枝、日月等。據《千光眼觀自在菩薩秘密法經》每一隻手都「得二十五三昧，斷二十五有」，四十手即具足千數。因此，千手千眼觀音菩薩的手盡持慈悲，能遍及全宇宙，救濟諸有情。

主尊觀音的兩側圍繞著十八尊脇侍，其中包括最下方的各一尊明王，以及敦煌首度出現的金剛界曼荼羅金剛輪內四隅之尊像，又稱內四供養菩薩，即金剛歌、金剛舞、金剛嬉、金剛鬘；而金剛界曼荼羅外院四隅之尊像，也稱外四供養菩薩，即金剛香、金剛花、金剛燈、金剛塗等密教眷屬。牠們的排列錯落有致，王靜芬教授認為此鋪壁畫曼荼羅式之構圖在敦煌是先例。的確，本鋪經變具有重要指標性意義，因為其後的千手千眼觀音經變皆依循此鋪之模

式，頂多是背光的火焰紋改繪為千手眼、脇侍數量變多及畫面細節較為豐富而已，如晚唐第14窟南壁的壁畫。（圖4）更有興味的是，中、晚唐經變的位置不但多居主室的壁面，而且畫幅面積增大，充分顯示千手千眼觀音信仰在敦煌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不空羂索觀音菩薩

不空羂索觀音（Amoghapaśa）亦為變化觀音之一，所謂「不空」是指心願不落空，「羂索」原為印度戰爭或狩獵時所用之繩索武器，取其

羂索即出，必有所獲之意，也就是濟度有情至彼岸之法器，此尊名稱說明觀音是一尊濟度心願終不落空的菩薩。有關祂的漢譯經典大部分完成於六世紀末至八世紀，雖然至少有十一部之多，但不是同本異譯，就是同本節譯，可見其重要性。其中有關解脫病苦的經文如下：《不空羂索神呪心經》「受持齋戒誦此滅心，……若忽遭寒熱等病，或（省略諸病名）所有逼切身心苦惱及見惡夢……悉得消除。」甚至在《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卷一記述，在不空羂索觀



圖3 盛唐 千手千眼觀音經變 敦煌莫高窟第148窟主室東壁 取自彭金章主編，《敦煌石窟全集·10·密教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圖版26。

音像前，供養持誦此真言經四十九遍或一百零八遍者，能於現世得二十種功德勝利和臨命終時之八法，前者的第一個功德即為「身無眾病，若有宿業病生速令除差。」還有《不空羂索陀羅尼自在王呪經》卷一提及「若有常誦此神呪者，三業惡障皆悉銷滅。若誦萬遍，所須飲食臥具湯藥衣服什物無所乏少，安樂無病長壽自在。」卷二再度強調持呪者「一切病患能令除愈。」持誦此咒全方位的除愈功德，應是不空羂索觀音得到受病苦者崇敬的原因吧！

現存最早造像的文字記錄應是見於梵僧慧智（活動於七至八世紀）於693年觀看洛陽佛寺的觀音像之後而撰述的《讚觀世音菩薩頌》。頌文提到觀音像「伊尼鹿彩覆其肩」，若從王靜芬教授所匯整有關圖像描述的經典來看，唐代的譯經共有七本，面數、臂數、持物和姿勢各有不同，唯一的共同點是皆著鹿皮衣，不但能確認該寺的觀音壁畫即為不空羂索觀音，這個特徵也可以從敦煌遺例得到印證。

依據彭金章教授的研究，敦煌現存的八十



圖4 晚唐 千手千眼觀音經變 敦煌莫高窟第14窟主室南壁 取自敦煌研究院、江蘇美術出版社編，《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一四窟（晚唐）》，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6，圖版94。

幅不空羂索觀音經變，唐代就佔三十鋪，絕大部分的不空羂索觀音像都肩披鹿皮衣，例如第384窟主室南壁龕外東側的〈不空羂索觀音經變〉。（圖5-1）主尊以正面像呈現其作為禮拜式（iconic）尊像，冠有化佛，證明祂與阿彌陀佛的關係。滿月形的臉龐豐腴圓潤，肩披鹿皮衣，結跏趺坐於蓮臺上。敦煌石窟不空羂索觀音的臂數只有六臂及八臂兩類，此鋪菩薩為六臂，即胸前正雙手持蓮花和柳枝，右側手的持物分別為寶瓶及軍持，左側手的則是二叉戟及羂索。（圖5-2）頂懸華蓋，二飛天、日天、月天、四天王、婆藪仙、功德天、二明王、二龍王、毗那夜迦、毗那勒迦等布列於觀音的四周。

晚唐的不空羂索觀音經變與千手千眼觀音經變發展的趨勢一樣，構圖雖然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細節和眷屬都增加了。例如第14窟南壁的〈不空羂索觀音經變〉。（圖6）不僅僅是臂數為八臂，即胸前正雙手持蓮花，右側手的持物由上而下為錫杖、柳枝、胡瓶，左側手則為三叉戟、寶瓶、軍持，還有在主尊周圍的聖眾數量是敦煌石窟最多的密教經變之一，除了有內、外四供菩薩之外，還有金剛鉤、金剛鈴以及四天王等三十餘尊諸聖眾。此外，在華蓋及主尊之間，還出現一佛二弟子的三尊坐像，再度強調主尊與阿彌陀佛之間的關係。

彭金章教授認為不空羂索觀音像自大歷十一年（776）開始出現，一直繪製至西夏（1038-1227）為止，持續不間斷了四百年，反映了敦煌地區該信仰的情況。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不空羂索觀音像並非單獨存在，而是從一開始就是與其他觀音圖像成對地出現於壁面相對位置之上，即除了少數是千手千眼觀音之外，大多皆為如意輪觀音，造像的消長也是同步的。

如意輪觀音菩薩

如意輪觀音的梵文轉寫為 *Cintāmaṇīcakra*，是如意寶珠（*cintāmaṇi*）和法輪（*cakra*）之意，即指菩薩之持物，前者為世間珍寶及出世間實相之珠，能令有情



圖5-1 中唐 不空羂索觀音經變 敦煌莫高窟第384窟主室南壁龕外東側 取自《敦煌石窟全集·10·密教畫卷》，圖版54。



圖5-2 中唐 不空羂索觀音經變 局部 取自《敦煌石窟全集·10·密教畫卷》，圖版55。



圖6 晚唐·不空羈索觀音經變 敦煌莫高窟第14窟主室南壁 取自敦煌研究院、江蘇美術出版社編，《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一四窟（晚唐）》，圖版84。

生出福德，後者則是轉法輪之意，能令生智，象徵菩薩無盡的布施和隨應普現滿願的慈悲。相關的漢譯經典超過十部，大多為唐譯本，經文內容述說諸多現世利益，可以滿足諸有情所有之願求，其中一項當然與本文有關，例如《如意輪陀羅尼經·破業障品第二》敘述誦念陀羅尼能祛一切疾之利益，「若一日二日三日四日，

乃至七日熱病風病……一切疾病，種種災厄，魍魎鬼神，由經誦念皆得除滅。」又如《如意輪陀羅尼經·眼藥品第八》再論持誦此咒和儀軌可以除愈諸疾，「是陀羅尼明眼藥法者，令諸有情獲大勝利如意成就，聖觀自在與所求願一切圓滿。其藥……塗壇結界……盛銅器中置壇內聖觀自在前……先以藥塗聖觀自在足下……

當誦前三明一百八遍則當塗眼，所有翳障白暈眇淚，赤膜雀目胎赤風赤，眼中努肉皆得除差。第二度塗者所有頭痛，或頭半痛口諸疾病，壯熱病一日發二日發三日發。或常發者悉皆除差。第三度塗者。一切諸惡神病鬼病癩癩風病，乃至八萬四千神鬼，種種病惱悉得除愈。」這些疾病聽起來都令人感到苦惱，更遑論，飽受苦楚的患者會是多麼得無助呢？無怪乎如意輪觀音能成為具有除愈諸疾特質的禮拜對象呢！

敦煌如意輪觀音經變現存八十幅，唐代就佔三十二鋪，也是始見於盛唐，但僅只有一例殘跡，形象無法得知。以中唐第 358 窟東壁門北



圖7 中唐 如意輪觀音經變 敦煌莫高窟第358窟主室東壁門北
取自《敦煌石窟全集·10·密教畫卷》，圖版47。

壁畫為例（圖7），構圖模式與圖3至6極為相似，華麗的寶蓋下有一佛二弟子，主尊四周布列著諸聖眾，如金剛舞、金剛鬘、金剛香、金剛花菩薩、婆藪仙、功德天、二龍王、四天王、二飛天、二明王，還有三身供養菩薩。主尊為六臂之觀音，頭部微向右傾，以配合思惟相的右上手，符合諸經對形象之描述；同時扭腰、舒坐之姿，以及手臂位置之經營，使得主尊動感十足。線條細膩，形象優美。正右手施無畏印，正左手持珠，左下手施印，右下手按光明山，最重要的左上手頂著如意輪，標誌主尊為如意輪觀音。圖像發展的模式也與前述圖像一樣，構圖基本上沒有變動，只是聖眾數量增加，以及一些細節之呈現，例如晚唐第 14 窟北壁經變（圖8）主尊左側中央的金剛燈菩薩，祂的右手握著左腕，左手持曲柄花燈座一只，燈焰燃出熊熊的紅色火苗，細節的描繪栩栩如生。

藥師佛

從藥師佛（Buddha Bhaiṣajyaguru）名稱來看，無疑是一尊度濟世間病苦的大醫王。祂又名藥師琉璃光（Bhaiṣajyaguru-vaiḍūrya-prabhā）如來，是東方淨琉璃世界的教主。該信仰可能源自於印度西北邊境或是中亞，向東傳至中土流行後，再傳往日韓等地，是東亞佛教信仰中重要的尊像之一。

根據李玉珉教授的研究，《大正新脩大藏經》收錄的相關經典至少有十六部漢譯的經典，而唐代盛行的譯本則是玄奘所譯的《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因譯文流暢，傳抄甚廣，至今敦煌藏經洞遺存的藥師寫經至少二八七部，其中玄奘本的數量竟高達一四三部，足見其重要性，也是唐代經變的主要依據。這些譯經形塑出藥師佛帶有濃厚的現世色彩，能利益

有情，化災解厄，濟度衆生。當然，與本文有關的則是藥師佛所發的第六大願，即令有情「無有病苦」、第七大願「病悉得除」以及延年益壽等，應該就是這些悲願讓信衆皈依的原因吧！

有關藥師信仰的文字記錄，目前發現最早之記載應發生在西晉太康六年（285）（詳《十二硯齋金石過眼續錄》卷四），而最早的紀年造像遺存

則是龍門古陽洞南壁一龕北魏孝昌元年（525）銘的三尊像，從題記內容可以得知此三尊像分別為彌勒、觀音和藥師。³敦煌莫高窟壁畫藥師佛像的數量龐大，至少有四七〇尊以上，經變則高達九十六鋪，其中唐代就佔五十六鋪，數量超過一半以上。⁴其中，盛唐晚期的第148窟，不論從構圖布局，或是圖像組合，都是藥師經



圖8 晚唐 如意輪觀音經變 敦煌莫高窟第148窟主室北壁 取自《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一四窟（晚唐）》，圖版136。



圖9 盛唐 藥師經變 敦煌莫高窟第148窟主室東壁北側 取自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第3冊，北京：文物出版社、東京：平凡社，2013，圖版36。

變發展的指標性基石。

第148窟的藥師經變（圖9）位於主室東壁北側，構圖不但不同於隋代（581-619）以說法圖式的簡約形式，反而呈現東方淨土恢宏的氣勢，充分流露出樂土的豐富性以及所求皆得的

歡悅感，符合玄奘譯本強調藥師淨土「亦如西方極樂淨土」；同時也無視於隋代藥師經變的對應位置為彌勒上生經變，進一步沿襲初唐以來之模式，應對位置的配置皆為阿彌陀經變，不但顯示藥師信仰契合時代的脈動，而且一直



圖10-1 9世紀 藥師經變帛畫 高206，寬167公分 敦煌莫高窟第17窟出土 大英博物館藏（1919,0101,0.36）取自大英博物館編，《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ステイン・コレクション》第1冊，東京：講談社，1982-1984，圖版9-1。

延續至西夏。

許多平臺布列於大型的蓮池中，其上各有獨立的亭臺樓閣，諸佛菩薩或立或坐於其間，熱烈地參與盛會。這個說法盛會就是由畫面最中央的主尊所主持的，脇侍在左側的是雙手護

持日輪的日光菩薩，而相對應的右脇侍則應為月光菩薩，祂們又各自為諸聖眾所圍繞。蓮池出現各式往生淨土的化身，大型的伎樂團隊歡樂地演奏。後方繪有富麗堂皇的宮殿樓閣，諸佛菩薩乘祥雲而至，各式樂器飛舞空中，彷彿自動響奏天樂，這些種種美好的說法盛會景象就是正在描繪令人心生嚮往的樂土。雖然這番景象十足像極了西方淨土，可是卻在畫面最下角各有六尊神將，祂們的出現標誌此淨土為東方藥師淨土，因為經典有云十二位藥叉大將於盛會中，誓願護衛受持該經的信徒。同時，在此畫面的兩側有條幅，繪有帶榜題的藥師十二

大願及九橫死的內容，而榜題的文字內容正是出於玄奘譯本，更能說明此經變為藥師經變。

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藏有一幅九世紀的藥師經變帛畫（圖 10-1），它的尺幅堂堂巨觀，以暖色系為主的設色富麗堂皇，經變內容的豐富度與前述壁畫相比，在伯仲之間。然而不同於圖 9 淨土的全景式構圖，本幅為縱向式的構圖，人物景象較為集中，主從較為明顯。雖然諸聖眾的姿勢較少變化，顯得比較靜



圖10-2 9世紀 藥師經變帛畫 局部 6神將 取自大英博物館編，《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ステイン・コレクション》第1冊，圖版9-12。



圖10-3 9世紀 藥師經變帛畫 局部 6神將 取自大英博物館編，《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ステイン・コレクション》第1冊，圖版9-13。

態，但是十二尊藥叉大將的表現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因為圖 9 的藥叉神將與其他聖眾共同列坐於一個平臺上，而本幅下方的兩座平臺上，純粹只見藥叉神將；同時，他們的外形也較為容易辨識出神將的身份，即皆以戎裝示現。（圖 10-2、10-3）這些變化不但在在強化了藥叉大將在經變中的重要性，也符合玄奘譯本所述，該經「亦名說十二神將饒益有情結願神咒」。本幅最特別之處是淨土景像的最上端和最下端出現密教尊像，即畫面右上角的千手千鉢文殊像、左上角的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圖 10-4）、左下角手持如意輪的如意輪觀音及右下角的不空羂索觀音。⁵後三尊的變化觀音同時示現於此藥師經變中，似乎反映他們的神格與藥師佛之間的聯繫，尤其在除患祛疾方面，皆具有無往不利的現世允諾，如同本文前述變化觀音種種除愈諸疾之特質。



圖10-4 9世紀 藥師經變帛畫 局部 千手千眼觀音 取自大英博物館編，《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ステイン・コレクション》第1冊，圖版9-5。

餘論

謹奉上本文略述諸佛菩薩之慈悲及其宏願的無量功德，雖僅漫談有唐一代的佛教尊像，掛一漏萬，但期以此微薄的精神慰藉不但能够回向亡者而達追薦之目的，也能稍事安撫平息

受苦患者之憂慮，如同以安慰劑的藥物治療一般，不啻為疾病防治的另類救濟之法，也是唐人的智慧。祈願諸有情在面對疫病之際，能無所畏懼，進而離苦得樂、康健無恙。

作者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

註釋：

1. 有關「病坊」一詞出現在中文文獻中的時間，目前找到最早的為成書於隋代仁壽四年（604）吉藏（549-623）所著之《維摩經義疏》卷一之「病坊菩薩道」。然而與「病坊」相似的機構似乎可以追溯至南朝齊文惠太子（479-502）所設立的六疾館，相關的研究詳見盛會蓮，〈唐代的病坊與醫療救助〉，《敦煌研究》，2009年1期，頁81-86。
2. 有關該窟的確切年代，多數學者皆依據前室遺存一方具有大歷十一年（776）紀年銘的〈大唐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而訂定該窟完成的下限。同時，不論是政治、圖像或是宗教意義，該窟都具有指標性的重要意義，詳見於公維章，《涅槃、淨土的殿堂——敦煌莫高窟第148窟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3. 有關藥師信仰文字記錄所載之年代，其時並無現存之漢譯經典與之呼應，但遺存之紀年造像年代，則有經典譯出，並廣為流行，如惠簡抄撰於大明元年（457）的《灌頂經》。有關該紀年題記，詳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龍門石窟の研究》（京都：同朋社，1980年覆刻版），頁308。
4. 據李玉珉教授的研究，隋代有四鋪、五代二十一鋪、宋代九鋪及西夏六鋪。雖然西夏數量銳減，但該時期的莫高窟經變數量普遍減少，僅剩西方淨土變和藥師經變少數幾種而已，可見敦煌於西夏時期，藥師信仰仍然相當重要。
5. 由於帛畫殘損不全，根據大英博物館官網藏品資料所示，右下角尊像僅能從冠有化佛和右上手持瓶等兩個特徵推測此尊應為不空羼索觀音，詳大英博物館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19-0101-0-36（檢索日期：2022年2月15日）。又，若比對前述之數鋪經變之主尊，似乎可以同意此推測。

參考書目：

1. 于君方著，陳懷宇、姚崇新、林佩瑩譯，《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2. 王惠民，〈敦煌隋至唐前期藥師圖像考察〉，《藝術史研究》第二輯，2000，頁293-327。
3. 王靜芬，〈七、八世紀觀音造像的繁衍〉，收入石守謙、顏娟英主編，《藝術史中的漢晉與唐宋之變》，臺北：石頭出版社，2014，頁193-224；王靜芬，〈不空羼索觀音新探〉，《敦煌吐魯番研究》，15卷，2015，頁17-52。
4. 史忠平，《莫高窟唐代觀音畫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5. 朱瑤，《敦煌漢文文獻題記整理與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6. 安文麗、董粉和，〈古代僧醫瘟疫救治活動研究〉，《中華文化論壇》，2021年5期，頁92-99、158。
7. 李玉珉，〈敦煌藥師經變研究〉，《故宮學術季刊》，7卷3期，1990年春季，頁1-39。
8. 陳磊，〈行走於現實與想像之間〉，《史林》，2015年3期，頁39-46。
9. 陳慧霞，《歷代金銅佛造像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6。
10. 彭金章，〈敦煌石窟不空羼索觀音經變研究——敦煌密教經變研究之五〉，《敦煌研究》，1999年1期，頁1-24；彭金章，〈干眼照見，干手護持——敦煌密教經變研究之三〉，《敦煌研究》，1996年1期，頁1-24。
11. 樊錦詩、彭金章，〈敦煌石窟如意輪觀音經變研究〉，收入《唐代佛教與佛教藝術》，臺北：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2006，頁131-150。
12. 劉淑芬，〈從藥方洞到惠民局——僧人、國家和醫療的關係〉，取自中央研究院唐宋社會變遷網站資料 <http://www.ihp.sinica.edu.tw/~tangsong/papers/lau941210.pdf>，檢索日期：2022年2月14日。
13. 鄭實秋，《唐代疫災防治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2。
14. 戴曉云，〈水陸法會的功能在唐五代的嬗變〉，《敦煌學輯刊》，2019年2期，頁100-109。
15. 顏娟英，〈唐代十一面觀音圖像與信仰〉，《佛學研究中心學報》，11期，2006年7月，頁85-111。